



方以智心性论研究

Research on Fang Yi-zhi's Thoughts about
XIN and XING

刘元青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方以智心性论研究

Research on Fang Yi-zhi's Thoughts about
XIN and XING

刘元青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方以智心性论研究 / 刘元青著. —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11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7-303-17726-4

I. ①方… II. ①刘… III. ①方以智 (1611~1671)
— 哲学思想 — 研究 IV. ①B.248.9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71495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5532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
电子信箱 gaojiao@bnupg.com

FANGYIZHI XINXINGLUN YANJIU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刷: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165 mm × 238 mm

印张: 18.5

字数: 270 千字

版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5.00 元

策划编辑: 贾 静

责任编辑: 贾 静

美术编辑: 王齐云

装帧设计: 毛 淳 王齐云

责任校对: 李 茵

责任印制: 陈 涛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序

20 世纪以来，在晚明清初诸大思想家的研究方面，有关方以智的研究相对而言是极不充分的。其中原因有很多，在笔者看来，主要由于以下两点，一是方氏全集的整理、出版工作相对滞后，很多重要文献目前仍以手抄本的形式沉睡于博物馆，研究者很难寻到第一手材料；二是方以智斑驳陆离、支离连犴的语言风格及其卮之、寓之、不住一法的思维方式，让学人望而却步。有此二虎挡路，方以智的思想长期处于沉寂状态，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刘元青博士在武汉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博士学位期间，跟随我学习明清哲学。一开始，我要求他研究方以智，他很不乐意，原因就在于方氏著作过于艰深，不易把握。他的硕士论文题目由我确定，研究方以智《东西均》一著中的“三教”归儒的思想倾向。在他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要求他继续深化方以智思想的研究，他犹豫再三。经过几次商讨，他最终勉强同意。即使这样，他中途还曾经想改做戴震思想研究，我没有同意。我个人对方以智没有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但确信他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人物。

在博士生收入极其微薄的三年时间内，刘元青选了一个极其困难的研究题目，吃了不少的苦头。当时，他夫人没有工作，小孩也在身边，其中艰辛，只有他自己及其家人知道，他人无法体会。好在皇天不负有心人，其博士论文最终获得优秀成绩。工作之后，他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继续拓展研究，其成果获得全国社科规划办统一立项出版。这是他近十年来潜心研究方以智思想的成果，相信此著的问世，对于当前汉语世界里的方以智思想的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面向。

概略言之，该著在以下三个方面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成绩：

其一，作者从心性论的角度与“当谓”的解释层面研究方以智的思想，这是一种新的视角与方法。相较而言，以往研究成果多将方以智的科学思想、辩证法、唯物论、方氏易学等作为研究视角。这些研究成果要么过于西化与现代化（如科学思想、辩证法），要么过于狭隘化（如方氏易学）。方以智的思想虽然表现出融合三教、兼法西学的“折衷”特色，但从根本处说，还是深受宋明以降心性论传统的影响。心性论虽然不能视为首选的优势视角，但却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打开了方

以智思想探究的新面向。本书按照道体→心性→情→工夫→境界的逻辑次第展开对其心性论的探讨，以前被学界忽视的领域，如方以智的天道观、“公心”、“公性”，以及相关的工夫论与境界论等皆首次进入了方氏思想研究视域。与此同时，方氏著作中许多具有强烈历史意识的闪光思想，如“道寓于艺”的新道器观，“睡食色财名，有情之五因”对“情”的新认识，“无故不去琴瑟”的境界论及对阳明后学“狂邪”态的批驳等也随之被发掘出来。由此，方以智在中国传统思想史中的重要学术地位与独特价值，亦在此显现出来。再者，作者通过对方以智“心即是天，天休歇耶？自強不歇，於穆不已”、“以上贯下，即无上下”等思想的研究，可以发现，牟宗三以刘蕺山能够“紧扣於穆不已之天命实体以言太极真体与性体”为标准，而认其“诚不愧为一殿军”的说法，还不是最终的结论。又如，作者通过对方以智“全树全仁”的整体性思维方式的研究，揭示出诸如培根、护干、除虫、收实等利用、厚生之实事（当然也包括“质测”之学）与仁（价值）之间存在深刻的内在统一性。凡此等等，都是从心性论角度发掘出方氏思想中的新认识、新内容。

其二，作者对方以智主要著作中的语言脉络进行了细致地分析与研究，揭示出方以智“变”的语言形式与“不变”的思想内容之间的关系，较为准确地把握了方以智的用语特征及其思想表达的独特风格。对于此点，没有长期认真、深入地阅读原著的工夫，作者是不可能有这样的自觉的。如作者于首章所言，方以智兼收百家之说，欲自成一统，又不能让诸范畴之间“打架”，故各有自己的语脉环境，此乃治其学者，尤为注意之处。比如：我们可以言“太极藏于六爻”，但绝不可说“所以然者藏于六爻”，此为其易学之语脉；可以言“所以然者生不得不然”，但不可说成“太极生不得不然”或“中生不得不然”，此顺朱子之语脉言说天道；同样，我们可以说“四围莫非中五”，但不能说“四围莫非至理”、“四围莫非公因”，此乃其家学或师授之语境，等等。在《易余》和《东西均》等著中，糅合了多种语境，如果不理解方以智的语言特色，学者就很难理解他的思想表达方式。因此，对于方以智思想与语言中“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要有一个恰当地把握。“变”为其兼收各家思想的语言形式，“不变”者乃其强烈的文化担当意识。

其三，其他具体方面所取得的新成就。如实而论，该书在一些具体论述中所表现出的创新性，有很多地方值得一说，限于篇幅，略举数端，与读者共享。第一，对方氏著作中“一在二中”、“举一明三”及对“交”、“轮”、“几”等重要哲学范畴的诠释与理解，作者提出了不同

于以往学者的看法。这些看法可以保证方以智思想的系统性与连续性，并能有效地发掘出其中的文化意义及方以智的历史意识。第二，与上述相关联的是对“质测即藏通几”的新解读。“质测即藏通几”是方以智的重要哲学命题。作者对此命题的理解不仅契合中国传统文化及方以智本人的思想表达特征，而且还能与“真智、内智，必用外智”、“外学多，内学一”、“一在二中”等说法之间，相互获得支持与印证。第三，对方氏著作中“所以然”、“即”、“中”等哲学范畴的分析，也很有见地。如作者有理有据地认为，方氏著作中“所以然”是“於穆不已”之神，是“无息之至一”，此与朱子的“所以然”有明显的区别。再如，该著以为方以智所言“即”有三种不同的意思：“二即一，一即二”以及“太极非阴阳，而阴阳即太极”等，其中“即”是圆融之“即”；“三即一，一即三”和“心即是天”中的“即”是判断意义的“即”；“前即后、后即前”、“昼即夜、夜即昼”以及“生即死”等“即”，是从贯几不偏于一隅而言昼夜和生死的交、轮之关系。作者做这些细微的区分，对于解读方以智的不同语境中的哲学思想很有必要。还有，作者对方氏著作“中”的分析，能够联系自北宋以来的主要理学家们的观点，以彰显其学脉之所在。第四，在修养工夫方面，该著注意到方以智继承了北宋程明道的“识仁”之法，并指出二者之异：程明道等理学家重在立体，方以智则体用双显，特别强调了被理学家视为“粗迹”的谋生技艺之于成圣的必要性。第五，对方以智思想归宗的认定之新。目前，对方以智思想的定位可谓众说纷纭，刘元青博士不限于成说，他将方以智的思想置于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从文化自身演进的连续性与继承性的角度，首次以其心性论为标准，对其思想进行重新定位。虽然该著的最终结论还有值得商榷之处，但他的学术态度与勇气值得肯定。

《方以智心性论研究》所取得的成就绝不仅仅是上述提到的几个方面，相信学界同行认真阅读后自有体认。当然，作为研究方以智心性论的第一本著作，其中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可以理解。比如，此著有重复引用某些第一手材料的现象，这可能与方氏著作“本体即是工夫”的语言特征有关，以至于作者很难从本体与工夫等不同层面将原文区别开来加以引用。再如，作者关于方以智思想归宗的分析，似乎对《东西均》一书中提到的“大成均”思想注意得不够。作者花了大量笔墨辨析方以智亲人、学界前贤对方以智思想宗旨的种种说法，皆能言之成理，然而作者在确立自己的观点时，材料与论证都不是很充分，留下了某些遗憾。不过，作者在讨论此一问题时提出的方法，如不泥

于文字之迹，倒是值得肯定的。

元青为赤诚君子，亦有一些“当仁不让于师”的古人之风，在当今学术界，聪明的、有较好学养的青年学术才俊不少，但有意志力且保持赤子之心于学问的人却不是很多。我真诚地希望元青博士在此著作出版之后，能够继续深入研究方以智思想的其他面向，与学界同行携手并肩，共同推进方以智思想的研究。以此共勉。

是为序。

吴根友

2014年6月

目 录

引 言	(1)
一、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2)
二、本书的研究方法、重点与意义	(6)
第一章 “圆满周遍，觐体灵明”——方以智的天道观	(9)
第一节 “因时设施，各有方言”——“於穆不已”之天道诸异名及 内涵	(9)
一、天道之诸异名	(10)
二、天道的内涵	(37)
第二节 “举一明三”——体用相即的圆融论	(41)
一、“善巧而理数之”：“一”、“二”、“三”的内涵	(42)
二、“一在二中”的体用圆融论	(48)
三、“举一明三”的两种涵义	(65)
第二章 方以智的心、性观	(80)
第一节 “人物灵蠢各殊，是曰独性，而公性则一”	(80)
一、“名之曰性，以名其功能之蕴藏焉”——论“公性”	(81)
二、“人物灵蠢各殊，是曰独性”——论“独性”	(97)
三、“公性在独性中”——“公性”与“独性”之关系	(102)
第二节 “公心寓于独心”	(108)
一、“心即是天”与“人能弘道者心”——论“公心”	(109)
二、“公心寓于独心中”——“公心”与“独心”之关系	(121)
第三章 方以智论善恶与情	(140)
第一节 “至善在善恶中”的善恶论	(140)
一、“称本体为善，犹称本色为素也，非恶所取对也”	(140)
二、“源善流恶、至善在善恶中”	(151)
第二节 “情不可纵，亦不可灭”的情欲论	(164)
一、“情由性发、性因情显”的性情观	(164)
二、“情不可纵，亦不可灭”的“性其情”论	(169)
三、“圣人之情应乎物而不累于物”	(174)

第四章 “打通内外”的工夫与“率性”之境	(182)
第一节 “打通内外”的工夫论	(182)
一、“但肯尽心，自然见性”	(182)
二、“格破内外”与“致无知之知”	(192)
三、“外学多、内学一”	(203)
第二节 “从心率性”及对“礼”的思考	(209)
一、“率性”与“无故不去琴瑟”	(209)
二、“文礼俱是从中发出”与“法为中下立”	(216)
第五章 佛教对方以智心性论的影响及其思想之归宗	(227)
第一节 佛教对方以智心性论的影响	(228)
一、“且行异类，托之冥权”——方以智逃儒归释的原因	(228)
二、“从而三之”的思维模式与天台宗“三谛圆融”	(233)
三、“拈《华严》之华(花)”——华严宗对方以智心性论的影响	(239)
第二节 关于方以智的思想归宗	(242)
一、对方以智本人及其亲友说法的辨析	(242)
二、本书对方以智思想归宗的思考	(246)
附录：方以智生平及哲学思想研究综述	(250)
一、关于方以智生平的研究	(251)
二、方以智著作的流传及整理	(256)
三、关于方以智哲学思想的研究	(258)
四、对方以智学术成就及其思想归宗的认定	(267)
索引	(271)
参考文献	(277)
后记	(284)

引言

方以智(1611—1671)，字密之，号曼公等，明万历辛亥年(1611)生于安徽桐城一个世代为官的书香家庭。处优于人的治学环境中，他自幼就显示出非凡的才识。方以智自述云：“年十五，十三经略能背诵；班史之书，略能粗举，长益博览百家。”^①加上他生性好游、交友，又因心系时政而直谏不讳，故“弱冠负盛名”^②，“名噪海内”^③，何如宠谓其“深悉一时之故，诚不下汉室贾生也”^④。方以智年三十中进士，然明王朝不久覆亡，他遂走南都，又因阮大铖之诬而亡命岭南。后桂王即位肇庆，拜为詹事府左中允，因权璫乱政，辞中允之命，留病梧州。而肇庆、广州又变，密之扶病入夫夷山，变姓名于沅州天雷苗中，可谓“数年之间，国统三绝，行在五迁”^⑤。清顺治八年(1651)，方以智被清兵搜获，许其在梧州的云盖寺出家为僧。次年，随施闰章返桐城，为逃避清廷征用，遂受戒于南京高座寺。清康熙四年(1665)，入主青原。清康熙十年(1671)罹遭“粤案”，在南解途中，舟行万安惶恐滩时“完名全节以终”^⑥。

方以智一生留下《物理小识》、《通雅》、《博依集》、《浮山文集》、《易余》、《东西均》、《一贯问答》、《药地炮庄》等著作，所论遍及诗文、音韵、天文、地理、医药、经学、哲学等方面。方以智的思想极富创造性与开放性(即他所说的“容通”)。他处于国破家亡、内外交困的时代背景下，以一种医者治病的心态将古今中外的学问当作药材，集于一炉而烹煮之，正如他所说：“我以十二折半为炉，七十二为鞴，三百六十五为课簿，环万八百为公案，金刚智为昆吾斧，劈众均以为薪，以毋自欺为空中之火，逢场烹饪，煮材适用，应供而化出，东西互济，反因对治，而

① 方以智：《又寄张尔公书》，见《岭外稿》中，《浮山文集前编》卷之八，罗炽教授藏手抄本(下同)。

② 宋玫：《激楚序》，见《曼寓草》上，《浮山文集前编》卷之四。

③ 魏藻德：《激楚序》，见《曼寓草》上，《浮山文集前编》卷之四。

④ 何如宠：《稽古堂初集序》，见《稽古堂初集》，《浮山文集前编》卷之一。

⑤ 方以智：《寄张尔公书》，见《岭外稿》中，《浮山文集前编》卷之八。

⑥ 方中履曰：“既而惶恐滩头，先公完名全节以终。”《宗老臣梅先生七十序》，见《汗青阁文集》卷下，桐城方氏七代遗书本，第29页。

坐收无为之治，无我、无无我，圜三化四，不居一名。”^①他以“东西互济，反因对治”的博大情怀广纳兼取，藉以救治由思想偏颇所引发的各种病痛。针对“各食其教而门庭重”的时下学风，他指出，明经正业，理当“合诸家之异同而使参详也，执一乎，水济水耳”^②。除此之外，方以智兼有“好究物理”与思辨于一身。《物理小识》与各类医药等著就是其“穷理极物”、“溺于雕虫”的智慧结晶。至中晚年，方以智从事更有意义的工作：他以心性论为理论基础，提出“一在二中”的体用关系说，充分阐发了传统儒家关于天道(包括仁心)与器(气)的圆融关系。在道器圆融一体的语境中，“道”与“艺”、“质测”与“通几”、义与利等，皆存在本体论意义上的关联。严格说来，“道寓于艺”、“质测即藏通几”才是程伊川“体用一原、显微无间”之意境的合理推阐；反之，贬抑经验知识(实学)并不合儒家体用圆融、立体致用的基本精神。

一、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方以智晚年罹遭“粤案”，在当时严酷的政治环境下，时人“咋舌摇头，如疫疠猛火不敢近”^③，有清一代学者多避而不称其说，其学亦不能流传于后。从《明儒学案》一直到《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录》以及《清学案小识》、《清儒学案》，都没有他的名字。当然，方以智的哲学著作不得其传，与其“厄之、寓之，支离连狎”^④的用语，亦存在直接的关系。特别是在中年以后，方以智著书好禅语、庄言，且会通《易》之旨，读者多不解。方中通哀述其父方以智曰：“异类中行，原非获己。行者固难，知者亦不易。”^⑤不仅如此，其著还多立寓言、巧说，难辨虚实，友人张自烈说：“余自信知宓山者，卒亦未能尽知，以其寓而不有也。”^⑥诸多原因终致方以智的思想及著作在其死后的三百多年时间内长期湮没不显。经

① 方以智：《东西均·东西均开章》，庞朴注释，北京，中华书局，2001，第20页。(以下仅注篇名与页码)

② 方以智：《通雅·读书类略提语》卷首二，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7册)，台北，台湾商务，1983，总第28页。(以下仅注篇名与页码)

③ 魏礼：《萧孟昉六十序》，《魏季子文集》卷七，三魏全书本，第38页。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增订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第79页有引用。

④ 方以智说：“读书论世，至不可以庄语而厄之、寓之，支离连狎，有大伤心不得已者。”《炮庄引》，《浮山文集后编》卷之二，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六辑)，北京，中华书局，1985，第43页。(以下仅注篇名与页码)

⑤ 方中通：《哀述》，《方中通《陪诗》选抄》，见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增订版)，第265页。

⑥ 张自烈：《闻炮庄与滕公刻语》，见方以智：《药地炮庄》，张永义、邢益海点校，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第2页。(以下仅注篇名与页码)

侯外庐、李学勤先生的努力,《东西均》于1962年得以行世,方以智的哲学思想也同时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余英时先生曾简要地概括了三百多年来学术界对方以智思想发掘的发展过程,他说:“密之著述等身,其传世者以《通雅》五十二卷、《物理小识》十二卷、《药地炮庄》九卷为最有名。其中《通雅》一书尤为学者所称道,四库馆臣至谓其开顾炎武、阎若璩、朱彝尊辈考证之先河。近五十年来,西学大盛于中土,密之因与明末耶稣会传教士极有渊源,故其著作中涉及自然科学与音韵学之部分备受世人之重视。自1962年密之遗稿《东西均》行世,世之治密之之学者又转其注意力于密之之哲学思想焉。”^①

方以智哲学思想受到重视虽然只是近五十年的事,但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果^②,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单篇论文除外):第一,在对方以智著作的整理和注释方面,除了上述提到的由李学勤先生点校的《东西均》(后附《象环寤记》)之外,庞朴先生于此贡献最大。庞朴先生的《〈东西均〉注释》于200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其意义在于,该著首次打破了方以智“寓而不有”的语言坚冰。接着,庞先生的《〈一贯问答〉注释》在2006年分别于《儒林》第一辑、第二辑连续刊出。这次虽然不是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面世,但相对此前《一贯问答》仅以手写本的形式沉睡于博物馆来说,其意义远远超出《〈东西均〉注释》。另外,由张永义教授、邢益海博士点校的《药地炮庄》,以及张永义教授校注的《青原志略》,分别由华夏出版社于2011年、2012年刊出,此乃二著首次以单行本的形式与读者会面。以往难得一见的珍贵资料,如《药地炮庄》之“总论”及“历代序跋”,得以全貌以飨读者。第二,研究方以智思想的专著。(1)蒋国保先生的《方以智哲学思想研究》于1987年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发行。此著力求以一定的方法论原则为指导来探求方以智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并提出了许多独特观点与看法。为完成此著,蒋教授“先后手抄了他的论著计百余万字,并且手抄了其祖、父以及师、友、子的著作计四十余万字,还对其主要的哲学著作《东西均》作了逐字逐句的注释”^③。(2)张永堂先生的《方以智的生平与哲学思想》于1999年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此著认为方以智“继承曾祖父方学渐‘藏陆于朱’”的思想又具有“三教合一”之目的,只是结论太多,缺少必要的深入分析。(3)罗炽先生的《方以智评传》于2001

① 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增订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第2页。

② 详见附录:《方以智生平及哲学思想研究综述》。

③ 参见蒋国保:《方以智哲学思想研究》“后记”部分,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以明清之际“天崩地坼”的历史大背景以及方以智坎坷的人生经历为基础，深入地透析了他的三教观、会通古今中西的治学方法，并对其哲学、史学、考据学和文学、艺术等方面进行全面细致的阐述，展示给读者一个鲜活的、立体的方以智全貌。

(4)2004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的余英时先生所著的《方以智晚节考》(增订版)。余英时先生在海外史料不足的情况下广收博稽，“考密之晚节先后十有余年”^①。其间余先生几易其说，许多方以智晚年隐晦不彰的事迹得以明朗化。除此之外，另有彭迎喜的《方以智与〈周易时论合编〉考》(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以及钱王刚先生的《方以智传》(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第三，研究方以智思想的博士论文。(1)谢仁真教授的《方以智哲学方法学研究》(台大哲学研究所，1995)；(2)周勤勤教授的《方以智“均的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3)；(3)刘贻群的《方以智〈东西均〉思想研究》(武汉大学，2006)；(4)彭战果的《方以智儒佛道三教会通思想研究》(山东大学，2009)。北京大学周锋利博士、中山大学邢益海博士亦致力于方以智哲学思想的研究。除此之外，还有美国彼德逊教授的《方以智：西学与格物》(*Fang I Chih: Western Learning and the Investigation of Things*, 1975)及《匏瓜：方以智与对思想革新之冲动》(*Bitter Gourd: Fang I Chih and the Impetus for Intellectual Change*, 1979)。遗憾的是，笔者至今无从得见彼德逊教授的著作。王煜先生的《读方以智〈东西均〉》一文后附有对彼德逊教授《匏瓜》一著的详细介绍。

尽管学术界对方以智思想的研究在某些领域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相对于同时期的顾、黄、王等思想家而言，方以智的思想尚处于待垦状态。据笔者所及，方以智早年具有强烈时代感的民本、君臣相通、读书善用，以及工商并举等政治经济思想鲜有人触及(侯外庐先生略作论述)；方以智“自古及今，无时不存，无处不有，即天也，即性也，即命也，即心也”^②这种他所谓“以上贯下”的天人一本的思想以及“提心宗而百家之理皆归一”^③的学术归旨等，亦尚未有涉猎者；他提出的“但肯尽心，自然见性”^④的工夫论，以及“从心率性”之境和“公心”、“公性”论等，均为目前学术界研究的盲区。

之所以如此，主要有如下原因：第一，对方以智思想的认识有待加

① 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自序》(增订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② 庞朴注释：《东西均·三征》，第47页。

③ 庞朴注释：《东西均·象数》，第204页。

④ 庞朴注释：《东西均·公符》，第106页。

深,尤其要发掘其思想之于当世的文化价值。我们要突破“合二而一”、“三教归《易》”等现有的认识,推动方以智思想的研究向更深处发展。方以智的个人思想有一种力图从其家传易学中挣脱出来的愿望,例如,他虽于《物理小识·总论》中说“每因邵蔡为嚆矢,征河洛之通符”,而其实是“但言克制生化之性”。第二,治方以智之学者多赖《东西均》一书。《方以智全书》第一册《通雅》于1988年已经出版,可到此为止,没有下文,这样势必限制了对方以智思想的全面考察。第三,方以智言语曼衍,寄寓出意,随时起,随时止,缩小了其著作的读者圈。第四,对研究者而言,学界在方以智思想的研究方法、认识角度方面,存在单一化的问题。如果欲深化与推进方以智思想的研究,必须改变现有的研究典范。

目前对方以智哲学思想的研究,一般多采用侯外庐先生的研究范式。学者们大多都从宇宙论、辩证法、认识论等视角,考量其学。这种方法固然是一种很好的研究模式,但产生于西方文化土壤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毕竟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所不同。学者们虽然处处力求注意中国文化特点,却因为使用的评价体系、概念、术语与中国本土文化有一定的区别,故难免有生搬硬套的痕迹。例如,目前很多学者将方以智“一在二中”、“举一明三”等说法置于“辩证法”的框架下来考量。有些学者干脆将“合二而一”之说与“一分为二”这种方以智从未有过的说法联系在一起。这种视“一在二中”(或“合二为一”)为辩证法的做法不是十分妥当,好像忽视了“一”之状词“於穆不已”,以及“一”之“神”性和“仁”的内涵^①。对于方以智来说,“一在二中”乃体用圆融之意,其中“一”是先天之“道”、“仁”、“理”、“心”、“性”、“太极”、“所以”、“中”、“神”,等等,它是“隐”、是“体”;“二”主要不是指相反、对立之“二”,而是指后天之“气”或“器”,亦为“多”,它是“费”,是“用”。与学者将“一在二中”理解为“辩证法”一样的道理,其“中天即在先后天中”被诠释为“宇宙论”;“太极藏身于一切爻,而人不能以一爻限量之”之说,曲解成他的家传易学。若如此,则真成为方以智所说的“直下卦爻中之太极,必汨汨日用不知矣”。另外,研究方法的单一性,还会造成方以智的许多闪光思想始终进入不了我们的研究视域,以及过度聚焦于某一点的做法。例如,“合二而一”的说法在方以智所有的著作中仅出现过一次,即“交也者,合二而一也”^②,但由于“辩证法”研究的需要,很多学者舍去主词“交”不论,而独

① 如方以智说:“一神于二,即器是道。”(见《通雅》卷首二。)又曰:“仁一,而甲坼之芽即二。”(见《东西均·公符》,第102页。)

② 庞朴注释:《东西均·三征》,第57页。

取“合二而一”为论。当然，这种“创谓”的诠释法本无可厚非，但相对方以智思想研究的现状而言，当前最需要做的还是应当尽量从解释学的“当谓”^①层面来理解其内涵。

二、本书的研究方法、重点与意义

研究方法的简单化，必然导致思想家所关心的某些重心很难进入研究者的视域，或以一种变形的样式成为研究对象。如果不能另辟新的研究方法，就很难突破既定的研究典范，更谈不上深化既有的研究成果。目前能够深透方以智“善巧而理数之”之“善巧”，对方以智建立在超越的、普遍的“公心”、“公性”基础上的“道寓于艺”、“质测即藏通几”等思想的深入探究不多见。有些文章即使涉及了“心”与“性”，也是基于“认识论”的研究需要，从而忽视了对作为价值根源的超越“公心”与“公性”的研究。这种现状皆因目前学界多采用相同的研究典范，以致许多文章的内容与说法并无实质性的区别。

笔者认为，除了继续推进侯外庐、冒怀辛、庞朴、罗炽、蒋国保等先生们的研究成果之外，我们还需要借鉴熊十力、牟宗三等先生的治学方式、方法。这不是一个谁是谁非的问题，而是为了共同的目的所采用的不同的治学方法与考量视角。

熊、牟二先生并没有对方以智的思想做过专门的研究，尤其是牟宗三先生从未提及过方以智及其学。熊十力先生亦只是“常闻”而已，他说：“常闻明季哲人方密之遗书，谓中学长于通几，西学长于质测。通几由修养而得，质测乃知识所事，其与吾侪今日之论，犹一辙也。”^②熊、牟二先生对中国哲学问题的思考，可以为我们研究方以智的思想提供诸多启示，如熊先生以为“一”为体，“二”为用，“三是包含一和二”的“全体大用”^③，以及称本体为“轮尊”或“恒转”的观点。我们不能说熊先生这种说法就与方以智的“一在二中”或“举一明三”，并且“一”就是“轮尊”的说法完全“犹一辙”，但我们却可以思考这样的问题：熊先生为何不以为自己在讲辩证法呢？或当代新儒家们或治新儒家之学的学者们就不以其为辩证法呢？再如，牟先生对程明道“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的思想有过独特精深的研究，而方以智“以上贯下”之天人一本的思想，或多或少地继

① “当谓”与“创谓”之说，参见傅伟勋：《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第51页。

② 熊十力：《熊十力全集》第八册，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第349页。

③ 熊十力：《新唯识论》，北京，中华书局，1985，第318～319页。

承了程明道所阐义理，我们为何要无视牟先生的研究方法呢？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同的研究方法各有其视域与盲点。由于本书采用了不同以往的研究方法，使方以智的心性论首次进入了研究视域，与此相关联的思想亦在本书中首次得到重视。

本书重点放在方以智的心性论方面，其意义如下：首先，心性论不是其家传易学所能包括的，本书以更高的视角将明清之交的思想家置于传统文化的历史脉络中加以考察。惟有如此，才能将其在中国传统思想史中的重要地位正确、客观地揭示出来。同时，我们通过对方以智“心即是天，天休歇耶？自强不息，於穆不已”、“以上贯下，即无上下”以及“太极非阴阳，而阴阳即太极”等思想的发掘，发现牟宗三以刘蕺山能够“紧扣於穆不已之天命实体以言太极真体与性体”为标准，而认其“诚不愧为一殿军”^①的说法，并不是最后的定论。依照牟先生的标准，虽然笔者还不敢说方以智就是宋明儒学之殿军，但至少可以说明方以智思想不是其家学或“三教归《易》”等现有说法所能涵盖的。

其次，通过对方以智心性论的分析，可以发现：其心性论不仅能够“紧扣於穆不已之天命实体以言太极真体与性体”，而且方以智思想所蕴涵的时代问题意识，是以《周易》、《中庸》、《论语》为入路，并契合《孟子》以心说性之义理，结合时代需要而开显出来的。例如，在道器关系上，方以智主要本《周易》，认为二者是上下相即的关系，他说：“阴阳即形下矣，而谓之道，岂非上藏于下而无上无下者乎？”^②又说：“太极非阴阳，而阴阳即太极。”^③意即阴阳是形下之气，不是道或太极；道是形而上者，不是阴阳之气。所谓“阴阳即太极”是就形下而指形上者，阴阳气化流行，化成万物，道就在其中呈现，但阴阳本身不是道。同时，道、心即是仁，有创生性，如他说：“仁，人心也，犹核中之仁，中央谓之心，未发之大藜也。”^④可见，方著中的“道”，即是《论语》的仁，又是《孟子》的心。以此为理论基础，他提出“道寓于艺”、“文章即性道”、“质测即藏通几”等具有时代特色的道器关系，肯定了各种实学技艺、文章事业、“质测”之学之于道的必要性；他以“即器是道”、“离二则一死”的体用圆融论为根据，不仅有力地驳斥了“末流习便，死执无所得之半边，一切荒忽。……公然诟扫天下之研极实学”之学风，而且将传统“器”的内涵

①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第344～355页。

② 庞朴注释：《东西均·全偏》，第147页。

③ 庞朴注释：《东西均·公符》，第110页。

④ 庞朴注释：《东西均·译诸名》，第164页。